

## 江亢虎《臺游追記》及其相關問題研探

許俊雅\*

### 〔摘要〕

江亢虎於1934年8月來臺，並出版了《臺游追記》一書。江氏歷游西方各國，他觀看臺灣的方式及追記所述之內容，大抵接近晚清以來的歐美游記內容，如對學校、博物館、圖書館、體操、婦學、鐵道交通設施等的紀錄。在臺期間他對臺灣的文化及婦女、僑校教育特別留意關心，也批判了日本在臺的若干政策，本文並討論此書的書寫形式及文獻意義，及江氏來臺所引發的一些問題：其一，因其提倡東洋文明，反對白話文，臺灣人士質疑他的遊臺動機，張深切、楊逵都曾撰文抨擊其言論。其二，楊逵兩篇文章所述與演講者江亢虎事後追記的出入，及楊逵〈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一文是否正式發表？對前人之說予以訂正。其三，江亢虎之作多次出現在《風月報》、《南方》，此現象與日華親善的關係如何？其四，接待他的臺灣名人楊肇嘉先生回憶錄何以片言隻字未曾提及江氏來臺一事？最後，依據各檔案史料總論其人其作。

關鍵詞：江亢虎、臺游追記、旅行文學、楊逵、張深切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鴉片戰爭一役擊敗了晚清帝國的信心，其後來自西方的船堅礮利，迫使中國一步步「門戶開放」，民族生存的危機開啓了知識分子走向世界的步伐，也改變了晚清人士看待西方的態度，迫切欲了解西方社會、認識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化。當時因為考察政治或學習技術或是出使、旅居駐外的機會，他們得以目睹與中國完全異趣的物產、制度、民俗風情等新事物，將旅行中的親身感知與見聞化諸文字書寫。因涉足異域後觀念的新變及不同於過往的內容，這些遊記呈現了一種新面貌、新文風，與傳統山水遊記判然有別。這些作品多是官派駐外人員或是考察人員或是個人行旅有感而作。如志剛的《初使泰西記》、郭嵩燾（1818-1891）的《使西紀程》、張德彝（1847-1918）的《航海述奇》、何如璋（1838-1891）的《使東述略》、薛福成（1838-1894）的《出使英法義比日記》、王之春（1842-？）的《東遊日記》、容閔（1828-1912）的《西學東漸記》、羅森（?-1900）的《日本日記》、黃慶澄（1863-1904）的《東遊日記》、王韜（1828-1897）的《漫遊隨錄圖記》、《扶桑遊記》、康有為（1858-1927）《歐州十一國遊記》、梁啟超（1873-1929）《新大陸遊記》、《歐遊心影錄》、女作家單士釐（1858-1945）《癸卯旅行記》，或者稍後朱自清（1898-1948）的《歐遊雜記》，李健吾（1906-1982）《義大利游簡》，陳學昭（1906-1991）的《憶巴黎》等，域外遊記成為近代文體中新的文壇景觀及特殊鏡像，也昭示了國民思想啓蒙路徑的演變。

傳統遊記除了騷人墨客遊山玩水之作，有不少是因仕宦謫遷，天涯淪落，其生命經驗內涵的轉變，使得作品既描述了山水勝景，同時也真實呈現作者的情懷，對審美客體力求能傳神寫照，也表現出一種滲透人生的睿智與哲理意趣。這些傳統遊記的描寫題材多半在本土，或者是較偏僻的邊疆異域，較少跨出國門，與晚清域外遊記著重介紹近代西方、日本政治經濟、典章制度、科學教育、格致器物、歷史地理等較具文化史料之現象相較，明顯不同。其實從文化內在變遷的角度來分析清代遊記，已經呈顯了與明人截然不同的面貌，清人的遊記書寫對藝術的曲盡物致以及講真求趣特質已非是主流論述，而是轉向知識性的探索及重視<sup>1</sup>，這與晚清經世之學亦有關聯。而知識分子遽遭世變之後，對域外西方現代文明的介紹

<sup>1</sup> [明末]徐弘祖：《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是一例外，其理性觀察的知識面與探索層次及客觀描述，近於晚清遊記之精神。

尤成重心所在，因此紀遊內容大致是介紹外國政治商業、文化教育，風俗民情及讚美工業生產帶來的經濟繁榮等，目的在於增廣見聞，備述異國風情，察考制度，改造思想知識，推動社會進步，激發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及至民國成立，內憂外患仍多，尤其九一八事變發生，知識階層將關注目光放在本土，旅行仍舊不以模山範水、攬勝愉悅、寄興抒懷為主，而在於配合時代需要，抱持經國之志，以俾於社會並供參酌之用。

這些遊記有其承繼與創新的面向，新舊離合的交錯，中外文化的碰撞，外在客體對旅行者內在主體的浸染與刺激，新式傳播媒體的興起，在在使遊記書寫策略與過去有所差異，如果我們把遊記的範圍放寬<sup>2</sup>，便不難發現有關記遊的部分也分佈於詩歌、調查研究的著作、考察報告和海外遊記、日記、筆記、詩集、聞見錄、書信、雜錄、隨錄等，如鐘叔和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sup>3</sup>，此一大批域外遊記，即多以這些型態出現。而在臺灣方面亦如此，從郁永河的《采硫日記》（一名《裨海紀遊》）、羅大春（1833-1890）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池志徵（1852-1937）的《全臺游記》、蔣師轍（1847-1904）的《臺游日記》、史九龍的《憶臺雜記》、胡傳（1841-1895）的《臺灣日記與稟啓》、汪洋《臺游日記》、黃強《臺灣別府鴻雪錄》，甚至周俟松（1901-1995）《隨地山臺灣行》<sup>4</sup>及本文擬討論的江亢虎（1883-1954）《臺游追記》等，這些紀行承載了旅行的新見聞，及伴隨著各地遊歷考察的特殊經驗，相當具有啓發性及參考價值。

<sup>2</sup> 當然有些是很專門的學術與實業調查報告，在性質上不屬遊記文類的敘事性文本可不列入。

<sup>3</sup> 湖南人民出版社原計劃出版六十種，實際從1980年到1983年的四年間出版了二十七種共二十冊；岳麓書社出版了三十八種共十冊。岳麓書社在2002年8月又出版了鐘叔和：《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2000年，另有鐘叔和：《走向世界：近代知識份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出版）。可說晚清域外游記相當豐富。然而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相關的游記收錄及介紹，則是未列入考量的。

<sup>4</sup> 「一九三三年春，地山在燕京大學任教時，利用休假時間，應中山大學之邀，前往廣州講學。我也同行。為了探望久別的故鄉和分手多年的親友，我們特意繞道臺灣，在臺北、臺中、台南等地逗留了十多天。這短暫的時日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時隔近半個世紀，往事仍歷歷在目。」「在臺灣；我忘不了日月潭的碧波蕩漾，奇花異卉。……避暑勝地阿里山。沿途景色悅目，驚險萬狀。山間時有五彩繽紛的彩蝶上下飛舞，向人群撲來，地山捕捉了一些做為生物標本。」許地山著，徐明旭等編選：《許地山選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712、714。

清代宦遊者所撰述的臺灣紀遊，就歷史而言，臺灣乃屬清治時期，中土人士來臺並不屬到國外，仍是王土所在之地，然而 1895 年之後中土人士來臺旅遊或觀光，則已是異國，在民族認知及感情思想上會是甚麼樣的情懷？江亢虎在《臺游追記·阿里山中》就說：「阿里山為日本帝國第一高山。其主峯即新高山。比富士尤高。」（頁 61）<sup>5</sup>似乎不脫以「日本帝國」下的域外眼光來感知臺灣。江亢虎歷游西方各國，他觀看臺灣的方式及追記所述之內容，大抵接近晚清以來的歐美游記內容，如對學校、博物館、圖書館、體操、婦學、鐵道交通設施等的紀錄。這趟行旅是否給予江氏自我改造或自我超越之思？追記所展現的內容與昔日的西方文明敘述有哪些是較特殊的？或者與其前來臺旅遊的梁啟超有何差異<sup>6</sup>？來臺後何以引發質疑其動機。及本書之書寫形式如何？本文對江氏此作的討論即是將之放在以上所述的大環境背景下來看問題及其特色，同時留意其前後相關的論述及衍生的一些問題。

## 二、關於殖民現代性的觀察與反思

江亢虎，原名江紹銓，別號康瓠，江西弋陽人。1901 年東渡日本考察政治，半年後奉調回國，應袁世凱聘任北洋編譯局總辦和《北洋官報》總纂。翌年再度赴日留學，與日本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片山潛（1859-1933）、平民社領導人辛德秋水（1871-1911）等人，圍繞政治經濟改革問題進行一些討論。同時接觸到歐洲的社會主義學說，並與其儒家大同思想兩相比較，認為多有「互相印證之妙」，從而初步形成其獨特的社會主義思想。1904 年因病輟學回國。任刑部主事和京師大學堂日文教習。1910 年春，再次出國旅游，經日本至歐洲各國。以其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主義」抵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同年於比利時撰就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無家庭意見書》。1911 年 11 月組織中國社會黨<sup>7</sup>，攻擊辛亥革命。1913 年赴

<sup>5</sup> 江亢虎此處所述有誤，新高山是指玉山。本文有關《臺游追記》之引文，可參 1935 年上海中華書局之版本及 2007 年文听閣《全臺文·臺游追紀》，為免繁瑣，不一一作註，頁碼直接書於引文之後，據中華書局版本。此二版本之異，在於文听閣出版者不附圖片。

<sup>6</sup> 1911 年梁啟超蒞止霧峰林家時，以推動議會運動爭取臺人權利之道鼓舞林獻堂，1934 年江亢虎訪林家期間見啟超墨寶，又不數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止，而二人臺灣行相關文字亦刊上海報刊，其巧合耐人尋味。

<sup>7</sup> 可參〈江亢虎致袁世凱信〉、〈袁世凱與中國社會黨〉二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

美，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文化課講師，主持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1920年夏回國。次年4月至蘇俄游歷，並以中國社會黨名義參與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2年經歐洲回國，在上海創辦南方大學，自任校長。撰寫《新俄游記》，攻擊十月革命。1924年宣布恢復中國社會民主黨，次年夏更名為中國新社會黨，自任總理。1925年因參加清室復辟案而辭去南方大學校長職務。1927年中國新社會黨解散後，即出任加拿大大學中國文學院院長及漢學主任教授。1933年秋回國。1934年配合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1935年，在上海發起組織存文會，反對白話和漢字改革。抗戰爆發後，避居香港。1939年9月應汪精衛（1883-1944）之邀由港到滬。1940年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委員、考試院副院長、代理院長等職。1942年3月任考試院院長。抗戰勝利後，於南京清涼寺為僧，後又逃至北京，1946年11月，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判處無期徒刑。中共建國後，被關押上海提籃橋監獄。1954年12月7日病死監中。

江氏來臺之事及《臺游追記》一書，幾乎不見於中國學界，除汪毅夫、李詮林外<sup>8</sup>，在汪氏生平敘述的1934年期間，亦不見記載此事，通常謂其1933年秋回國，即跳至1934年配合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其游記有《南洋游記》、《黍谷游記》、《南遊迴想記》、《新俄游記》等數種，但《臺游追記》很少被提及，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然而就臺灣游記文學而言，《臺游追記》理應被敘述及討論。江氏來臺於1934年8月22日由福建抵基隆，9月9日自臺北經基隆回中國，停留臺灣十九天<sup>9</sup>。回上海之後，先於上海晨報披露，1935年中華書局重訂刊行，出版了

---

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14-15。此文原刊《社會雜誌》第2期及第9期，1912年5月及8月。

<sup>8</sup> 二氏將《臺游追記》誤為《臺灣追記》。

<sup>9</sup> 其來臺時間新曆8月22日，根據以下材料：《臺游追記》云：「余以八月廿一日午，趁大阪商船鳳山丸啟行，……翌朝拂曉，船抵基隆。」《昭和新報》：「二十二夜，由臺北中華總會館林梧村氏，盛張送別宴，同時兼歡迎江亢虎文學博士歡迎宴，與會者百餘名。」第295號，昭和九年（1935）九月一日，第14版，《灌園先生日記（七）》（新8月26日 舊7月17日）：「江亢虎於五日前來臺。」離臺時間新曆9月9日，江氏在《臺游追記》云：「國曆新重九清晨，自臺北發基隆回國」，重九原是農曆9月9日，這裡特別用新曆，或許是日期比較易記。在《臺灣日日新報》則報導：「江博士七日早，視察臺北聖廟及市內各地，預定搭八日解纜之福建丸歸國云。」第12369號，昭和九年（1934）九月八日，第4版，同一版的「人事欄」亦謂「江亢虎氏，按八日離臺。」第8版則謂「瀛社例會，訂本八日午後二時，假大屯咖啡館開會一節，已如前報。茲因來臺之中國文學家江亢虎博士，

《臺游追記》。在臺期間他對臺灣的教育、文化特別留意關心，尤其是僑教方面的困境。他說：

臺灣各等學校。程度愈高者。日本人愈多。臺灣人愈少。是否程度不及。抑或別有限制。不可得而知矣。（見《臺游追記·高等學校》，頁21）

江氏又云：

臺灣小學校為日本人設立者名小學。為臺灣人設立者名公學。公學學生初來多不通日語。故特重國語一科。其他各科教授方法與材料亦與小學不同。程度均視小學略低。（見《臺游追記·臺人公學》，頁23）

又云：

臺灣唯一之大學。而實際上僅收臺灣學生三四十人。此可異也。（見《臺游追記·帝國大學》，頁19）

日本對本國教育非常重視，可是臺灣子弟卻難以進入高等學府深造，小學校、公學校教授方法與材料不同，梁啟超來臺時即見臺灣教育的不平等待遇，寫有〈公學校〉詩批判殖民當局，且指出殖民當局背後目的不在於培育人才，乃在於「貴人參我輩，本以服使命」，相較於梁啟超1911年之洞見，江氏之批評略遜一籌。1934年距離日本統治臺灣，已有三十九年，次年臺灣總督府即舉辦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對於日本推動的現代化、教育的普及等等大肆宣傳，識者莫不掘其居心所在。在《臺游追記》中較特殊的是對「僑校」教育的觀察，提供了對日據時期在台華僑研究的重要史料<sup>10</sup>。他對日本屢次干涉臺中華僑學校，後竟勒令停辦，提出強烈

---

南游旋北，欲乘九日福建丸歸國。瀛社同人，敦請江博士出席，社外吟友若欲參加者，會費一圓，當日袖交。又本期時間決欲正確屬行。」《詩報》云：「本期第二頁所揭之江亢虎博士墨影，係江博士將歸國之九月九日在基隆高砂樓上，書贈本報編輯係（臺灣新聞社基隆支局員）之橫批也。」90號，昭和九年（1935）六月十五日，綜觀排比此數則資料，江氏離臺宜是新曆9月9日。

<sup>10</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在臺「華僑」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3月初版），未參引江

的批評：

三年前會館創議建立華僑學校。當地官廳不許。因易名漢文講習會。開夜班二小時。已辦一年。屢遭干涉。去年竟勒令停止。因奉總督府通令。全島除公校外。不得有私立學校。至講習會則以日語為限。於是華僑子女學習國文國語之機會斷絕。余在會館見幼童甚多。皆遊戲無度。問何以不入公校。則以額滿見屏。雖臺人不允錄收。僑生更無論矣。中華總會館、總領事館、屢向總督府之文教局交涉。均無結果。並不宣示任何理由。但曰。此為政府治臺教育方針。決不改變。亦不通融而已。余此後歷游各埠。於演說或談話時。均以教育者地位。力詆此事違反人道與公法。並指斥為五洲萬國未有之苛例。對日本官廳。亦直陳所見。然如以水投石。收效亦微。（見《臺游追記·勒停僑校》，頁49-50）

到了嘉義參與地方官紳的歡迎宴，致詞時再次強調「華僑教育之重要。及特設學校補習國文國語之不可緩。希望各界援助贊成。」（見《臺游追記·嘉義遊觀》，頁59）及「（臺灣高等學校）學生七年合計六百餘人。日本人占五分之四。臺灣人不過百餘耳。華僑入學者僅二十餘人。」（見《臺游追記·高等學校》，頁20）對僑教之重視由此可見。而其所述與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所載一致，從1932年起，中華會館年年委請總領事館向總督府提出設校交涉，仍始終未獲同意，江氏來臺這年（1934）全島華僑大會宣言，即以「建設全島華僑教育」為年度主要工作，惜不僅無法實現，連過去獲允開辦的補習班、講習會、夜學會等均不准再開辦<sup>11</sup>。

做為旅人的江亢虎，經常將臺灣景象與自己國度相較，注意到臺灣與中國的差異，他甫一下船，映入眼簾的即是臺灣「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頓覺氣象不同。」（《臺游追記·基隆交通》，頁7），這正是經過殖民當局營造的臺灣現代化結果，相較於中國自然感

---

亢虎此書，但此書對在臺「華僑」的情況多所描述，如「會館組織」、「華僑現狀」、「茶葉一瞥」、「僑工賴以全活甚眾」、「勒停僑校」、「鄉情宗誼」及對中華會館之著墨等等，具有相當重要而豐富的史料價值。另見本文後面所述。

<sup>11</sup> 以「臺灣中華會館」為關鍵詞查詢《臺灣日日新報》，即可見諸這種種的報導。另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在臺「華僑」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3月初版），頁114。

受到一番新氣象，這種情形在日治前後五十年間來臺觀光旅遊或考察者的論著裡亦大都提及<sup>12</sup>。在《臺游追記·基隆交通》：「沿途所見鄉村風景。農家裝束。與漳泉間完全無二。惟公共建築。都市外觀。則一切皆日本式矣。」（頁7）當他到臺北，更說「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臺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歎也。」（頁15）。

他對於中國多舶來品有所反省，《臺游追記·市面外觀》：「窗口貨樣山積。五光十色動人。概屬日本物產。絕少歐美舶來。此與中國通商大埠所見不同。殊可注意者也。」（頁17）黃強在《臺灣別府鴻雪錄》則對中國煙草之進口說：「夫以臺灣人口三百餘萬，買入外國煙草，祇此區區之數，以視吾國人口四萬萬，社會習慣，幾以煙草為日用所必需，除本國有少數製造外，餘悉為舶來品，年中漏卮，不知幾萬幾千。利權外溢，無法挽回，比之臺灣，真可恥也。」<sup>13</sup>但較諸梁啟超〈游臺灣書牘第六信〉則遠不及梁氏眼光之敏銳，洞察之深刻。梁啟超云「此行所最生感者，則生計上之壓迫是也。一受此壓迫，殆永劫無擺脫之期。吾於全臺，遊歷過半，見其一切日用品，殆無不來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履及草履，所食之麵及點心，皆然。舉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國貨物，殆杜絕不能進口，保護關稅之功用，其可畏有如此者。臺灣本絕無工藝品，而中國貨則稅率殆埒其原價。其舍日本貨外，更無可用亦宜。而日本貨之價，亦遠貴於日本本境。以物價比例於勞庸，則臺灣物價之昂，蓋世界所罕見也。以故臺灣人職業雖似加於昔，每日所得工錢雖似增於昔，然貯蓄力乃不見其增而惟見其減。就此趨勢推之，其將來豈堪設想，而還顧我祖國，其將來又豈堪設想也。」梁氏進一步看到臺灣無舶來品背

<sup>12</sup> 即使到了戰後來臺擔任長官公署礦物科長的汪彞定也驚訝於臺灣的現代化，在回憶錄提及：「令我深具印象的，不是臺北的商業，而是教育、治安、電訊、交通、自來水和醫院之普及。」《走過關鍵年代——汪彞定回憶錄》（臺北：商周出版社，1991年）。

<sup>13</sup> 據汪毅夫〈臺灣游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臺灣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黃強赴臺旅行之年，《臺灣別府鴻雪錄》失記，據我考證推斷，其時當在1927年。具體日程，則如書中所記：11月19日從新加坡登舟啟程取道香港，於11月27日抵達廈門；又於11月30日從廈門登舟赴臺，12月1日抵達基隆，在臺居留十餘日（離臺日期，書中失記）。《臺灣別府鴻雪錄》乃於1928年5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發行。」《臺灣研究集刊》2000年02期，頁78。



後深層的緣由，並因之增強了「憂患意識與民族危亡感」<sup>14</sup>。

江氏見可以效法之措施亦往往直言，如主張每城中心設一公共理化博物館：「余在中國內地每見各學校理化博物一科。耗費甚大。實用甚少，且物皆舶來。又並不完備。主張每城中心設一公共理化博物館。供各學校輪流應用。今臺灣趨勢。似已如此。此實小規模都市中各普通學校所亟應採納仿效者也。」（《臺游追記·陳列館場》，頁 27）臺灣成爲其借鑒學習之對象。當時他搭乘臺灣縱貫鐵路火車，對沿途重要都市「每站皆有揭示牌。標明附近名勝及其路徑。并本站與上下兩站之距離里數。及當地海拔高度尺數。大站皆設飲食店雜貨店。其腳夫、汽車夫、人力車夫。均依官定價格。決無需索爭論之事。車站售票處、待車處、行李過磅處。雖極鬧忙。毫不擁擠。亦無遺失。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臺游追記·縱貫火車》，頁 46-47）不禁發出讚歎之聲。

他過去曾創立三所女學傳習所，所宣導的中國社會黨也曾積極宣傳男女平等，支援女子參政，因此對日治臺灣婦女的教育特別有感觸，他「往觀全莊公立之一新會。及林氏私立之革新會。各有夜班數起。實施補助教育。兩會聯合請余演說東西文化異同。聽眾三百餘人。大半林氏家屬。婦女亦不在少數。化行俗美，殊可羨也。」（《臺游追記·霧峯喬木》，頁 53）女子教育的開放程度正是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一新會、革新會於此起了作用。追記一書亦對臺灣女學各校「學科課程。規定劃一。家事體育。頗爲注重。據體格調查平均統計。臺灣女子比日本女子身長略高。而體重較低。胸圍發育。亦以日本女子爲優勝。余親見諸女生體操。四肢皆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此非徒尙美觀。實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臺游追記·女學各校》，頁 22-23）及「學生五百餘人。日本人臺人各半。年齡年平均十六歲。均四年畢業。體格健美。妝束樸雅。制服爲白衣黑袴。臂脛坦露。胸部豐盈。一矯從前閩秀嬌小玲瓏之習尙。是日適爲大掃除日。師生均親執箕帚。轆頭跣足。操作如農家婦。可敬亦可愛也。」（《臺游追記·高雄女中》，頁 74）日治時期注重體操課及體格調查統計，江氏所言臺、日女子體格調查結果確實與史料相符<sup>15</sup>，他認爲女子體魄亦是民族強弱人種興亡的一大問題，贊許對體格健美，勤於勞動的

<sup>14</sup> 朱雙一：〈梁啟超臺灣之行對殖民現代性的觀察和認知：兼及對臺灣文學的影響〉，《臺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頁86。

<sup>15</sup> 如加藤忠太郎：〈艋舺公學校兒童體格檢查成績〉即說不論男生或女生在胸圍、體重方面皆劣於內地，但身高較高。見《臺灣教育會雜誌》67號，明治四十年十月，頁16-22。

女性實可敬亦可愛。當然短短一個月的旅遊，所見者固是臺灣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現代進步的一面，背後殖民者支配剝削之事實，有時也很難一針見血指出。如殖民主義與體育提倡的關係，對日本殖民當局形構體操科、文明開化與殖民支配間的政策，或者在臺灣表面的現代化之下，臺灣人民所受的剝削壓制，江氏並未能多加著墨或者說並未洞見殖民體制下的各種政策、各種問題是應加以檢視的。

除詠女學生外，他對於娼妓之態度，隱約見出呼酒醉美、冶遊譁浪的文人氣息，席間贈以黃雞母治詩作，介紹生平御女過千的簡荷生君是豪士也，但他也認為「臺灣男女之界甚嚴。而浪蕩之風亦甚。可謂矛盾現象之一。……此風已流入閩南。臺妓尤獨登壟斷。」（《臺游追記·藝妓酌婦》，頁32）是日本殖民政府「頗鼓勵而維護之」。仍對現代都會尋歡嫖妓現象有所思考。

此書多次提及在臺期間各種活動備受偵察監視之景，從入境伊始「稅關檢查異常嚴重，對印刷品照相機尤特別注意……而隨身信札、日記、照片，亦逐件翻閱，並向光照勘。」總督府又派專員隨行<sup>16</sup>、「當地官廳又擬派人沿途招待」（實則有監控之意），「會場偵警密佈，每句皆譯記報告。」如在臺中與民治運動領袖楊肇嘉見面，「席間討論文化復興地方自治諸問題。……然堂下偵者四伏。不無鸚鵡前頭之戒。」（《臺游追記·醉月盛筵》，頁51）因此他說「可見政府對於思想言論監察之嚴。」對日本控制下的臺灣，最後得出一結論：「臺灣自割讓後。物質文明之發展。生命財產之安全。皆遠勝前清。惟有三事。最受限制。一。政治活動。一。言論自由。一。專利營業。此三事皆戰勝者之特權而被征服人民所不許參加享用者也。」（《臺游追記·詩社盛況》，頁39）

至於其來臺所引發之爭議，乃在於文白論爭及與文化振興問題<sup>17</sup>，導致新文學

<sup>16</sup> 《臺游追記·歷史博物》：「抵臺北之翌日。總督府派汽車來。並派招待員一人。隨同參觀公立機關、屬於文化教育性質者」。當時，中國有名文士來臺幾乎都見到這類記載，如周俟松〈隨地山臺灣行〉即云：「我們所到碼頭、車站、旅店等處，都有特務跟蹤，還美其名曰『保護』。當時臺灣居民是『夜不閉戶』的，因為員警隨時要闖進來檢查，如果有入夜晚未歸，就要判刑。行人道上不許有三人聚談。有一天，我們目睹日寇鞭打臺灣居民，據說日寇佔紀念碑上，少掉了一個金字，附近的居民，包括老人、小孩統統受到審問拷打。日寇還想方設法推行奴化教育，報紙、教科書全是日文，甚至強迫臺灣人改用日本姓名。我們的親戚林錦堂先生，是當地有名望的紳士，他曾從大陸返鄉，他對臺灣鄉親說：『我回到祖國了！』不料被日本兵聽到，上去就是兩耳光，還受到训斥：『什麼是你的祖國？』亡國奴的生活就是這樣啊！」同註4，頁714。

<sup>17</sup> 1934年，江亢虎與胡樸安、潘公展、顧實等人組織「存文會」，提出「保存文言」的口號

作家不悅，尤其在彰化那一場演講。翁聖峰在博論略微提及昭和九年（1934），江亢虎蒞臺所引發的新舊文學論爭史幾乎被以往的研究者所淡忘，江亢虎蒞臺所引發的爭論，在戰爭體制時期並被鄭坤五（1885-1959）及嵐映再次提出討論。之後翁氏撰寫〈賴和批評江亢虎的語言策略〉及〈江亢虎游臺爭議與《臺游追記》書寫〉二文，頗值一閱，其文俱在，而本文重點不在「文白之爭」，因此對此不再贅敘。

### 三、《臺游追記》書寫形式及文獻意義

《臺游追記》全文約一萬八千多字，分六十節，分別為臺游動機、護照手續、舟中一夜、基隆登陸、基隆交通、臺北稅駕、會館組織、華僑現狀、官廳招待、領館規模、市區概況、市面外觀、歷史博物、帝國大學、高等學校、女學各校、臺人公學、圖書館制、陳列館場、臺灣神社、新大成殿、各教寺院、藝妓酌婦、飯店宴會、旅館殷勤、大同講座、文藝座談、報館訪問、詩社盛況、大屯吟集、茶業一瞥、臺北兩橋、縱貫火車、臺中概況、勒停僑校、醉月盛筵、霧峯喬木、議會無望、彰化文廟、八卦溫泉、會場花絮、嘉義遊觀、公會演說、阿里山中、嚮導相失、新高瞻仰、山中吟詩、吳鳳廟貌、臺南名勝、臺南宴會、高雄攬勝、高雄女中、高雄宴會、新竹迴車、新竹酬酢、淨業唱和、投贈誌謝、鄉情宗誼、基隆歸舟、傷逝尾聲。江亢虎以簡易文言書寫，從旅途出發寫至旅程終站，9月13日底滬上陸為止。依照路程的時間順序，沿途記錄城市、名勝古蹟、商品文物，及華僑、日臺官紳歡迎招待舉辦之演說、座談會、宴會<sup>18</sup>等。以一位旅行者近距離的觀察，書寫他對異地生活的體驗和感受，以及歸國之後對本身生活文化的衝擊和反省，文本有著自傳性質，但也因離開現場之後的書寫，耳食之言不免直接用

---

，亦但很快受到激烈批評。1935年5月《現代》刊登了江馥泉文章，指出存文會的宣言中凡是被他標有底線的詞彙，都是「群經正史諸子百家」見不到的，其實就是來自日本的詞彙。

<sup>18</sup> 江亢虎《臺游追紀》記述赴臺中醉月樓、臺南醉仙閣、高雄高雄樓飲宴云：「主人循俗例。召名花侑酒。惟每席止二人。皆持壺侍立。隨飲隨斟。不陪客狎坐。不奪杯勸飲。不彈奏唱歌。尚不失雅人深致。」（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頁75。陳玉箴認為「飲宴方式大同小異」，見〈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3期（2008年9月），頁172。

諸於追記<sup>19</sup>。

借助本書的陳述，我們不難體會江亢虎初次見到臺灣在日本統治下，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產業、博物館、圖書館等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的震撼心情，或是面對孔廟（文廟）、赤嵌樓、五妃祠等古蹟名勝的懷想。一掃臺灣是瘴疾、生蕃、土匪、霍亂、黑死病盛行之叢蒙未開之地，然而讀者除了看到對文明、衛生之讚歎，真正富有竹林、紅瓦農家、芭蕉與水牛、白鷺等臺灣景致的生活圖像反而消失不見<sup>20</sup>，他來臺時正是炎熱酷暑的七八月，讀者可以看到高雄宴會時的揮汗不止，但陽光普照、色彩鮮明的南部地區的描繪並不鮮明，在南部的描寫重心，除了阿里山的日出、雲海、神木以詩呈現奇景外<sup>21</sup>，臺南名勝、高雄攬勝所述者總是以歷史古蹟為主，熱帶島嶼的氣息不多見。在北部時則以參觀植物園、博物館、帝國大學、高等學校、總督府圖書館、神社等為主，8月24日適遇臺灣重要熱鬧之節日——中元節，卻未見有所記述<sup>22</sup>，僅見其墨寶「斯文在茲」下，落款日期為「甲戌中元江亢虎」。及另張「身世兩忘」，刊《臺灣日日新報》。

<sup>19</sup> 如對吳鳳廟貌的故事描述，乃是以漢人立場、漢民族的文化思維的刻板傳聞。文中反而缺少對原住民生活形態的進一步描寫。依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研究日據時期，日人進入阿里山地區，發現吳鳳故事對當地人深具影響力，因而大為宣揚吳鳳傳說，以利其教化。後藤碑文以及中田直久的《通事吳鳳傳》，即強調其動機在於改革鄒族習俗，並為吳鳳修廟、演戲、編入教科書。見氏著〈從民間文學角度探討吳鳳傳說的演變〉，《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臺北：臺原出版社，1999年）。黃旺成：《新竹縣誌·卷七人物志》認為1934年，江亢虎帶日使命來臺，鼓吹東洋文化，其所發表之詩文，語多媚日，用典復錯誤迭出，純甫不值其所為，作四百韻長詩，駁其荒誕無經之誤，深受海內外人士讚揚。林耀椿：〈江亢虎在臺灣〉一文曾查卷九人文志，未見此詩，《臺北文獻》直字第149期（2004年9月），頁199。

<sup>20</sup> 相較於同時期來臺的北原白秋（1885-1942），江亢虎的觀看視角確實不同，白秋在1934年7月29日從神戶出發，8月20日從基隆返回，江亢虎是8月22日由福建抵基隆，9月9日自臺北經基隆返回，即白秋離台後兩天，江亢虎抵達臺灣，但白秋的臺灣遊記寫了城隍廟會、臺北夜情、南臺灣的水牛白鷺。兩人同樣觸及到的是妓女題材，但白秋由此觀察到臺灣還是本島人的世界。見北原白秋：《華麗島風物志》（東京：彌生書房，1960年）。

<sup>21</sup> 江亢虎：《臺游追記·山中吟詩》所錄之二詩，可見《詩報》第90號，1934年10月1日，頁2。然詩題及內容小異。詩作左側刊「江亢虎博士墨影」。

<sup>22</sup> 據林耀椿研究，「江氏到臺灣正逢中元普渡，故應景寫上中元，這兩張字應是在臺北寫就，先前應林雲霖等人所寫的墨寶。」同註19，頁203。



圖一：江亢虎先生書，見《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8月29日，第8版。

對臺北市城內、大稻埕、萬華三區域，則以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總結日本統治之能，臺灣同化之速，實可驚亦可歎，而人民生活其間的真正情貌反而不見了，相較於劉捷〈大稻埕點畫〉或徐坤泉〈圓環夜市〉的描繪，對庶民生活的關注之情顯然是缺少了一些，其中較值得敘說的是大稻埕的江山樓、藝妓酌婦，呈現商業活動的興盛與都市的獨特性。

整的來看，本書書名既是臺「游」追「記」，其紀游、游記部分卻較少，正如江氏在書中一再言及的：演講、座談、餐宴、參觀等等安排，勞人至極，「真走馬看花矣」（見《臺游追記·臺北兩橋》，頁44），或許真是行程緊湊，所接觸者又是如楊逵所說「歡迎他的傳統文化的權威人士有地主、資本家，加上員警，全都是位高權重之士」（見〈小鎮剪影〉），以致我們看不到庶民的日常生活，臺灣風物的特色。在全書中，讀者感到描寫生動鮮活的一段，反而是他脫離了既有安排，在阿里山與嚮導相失又驟逢大雨傾盆的窘境，讓人感同深受。這一段他提到「某君於沿途風景，似乎不甚了了，且絕不能加以解說，余祇得就同車中人，用日語詢問梗概」，讓人想起張我軍（1902-1955）〈南遊印象記〉<sup>23</sup>記錄了他的經驗：

本來我們都帶著雜誌預備路中看，但是因為想在途中找出什麼好風景來鑒賞，所以只靠著車窗往外看。沿途我問L女士有沒有新奇的景緻，伊說沒有，我自己也覺得平凡。車過了鶯歌附近桃園時，培火氏問我有沒有指鶯

<sup>23</sup> 張我軍：〈南遊印象記〉，《臺灣民報》90-96號，1926年2-3月，收入張光直編：《張我軍詩文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247。

歌石給L女士看，我陡然感着很失策，因為這一站只有這個鶯歌石最出色，而我卻忘了給伊說。……車將到新竹了，培火氏又站過來，指著右邊一面的田園說，這是新竹平野，臺灣四大平野之一，你又不給L女士說明，你這個嚮導者未免太不親切了。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就是新竹平野，培火氏太冤枉我了。

也許當時臺灣教育對周遭生活未多加灌輸，如果連張我軍都不甚清楚，那麼某君對沿途風景不甚了了，也就不足為奇。或許江亢虎的導遊也像張我軍一樣，以致讀者很難看到江氏搭鐵道一路南下又北上的沿途風光的描寫與感想。當然以晚清民國初年以來域外遊記的普遍情形來看，其知性寫作，實用取向才是重點，這種現象當然也可能牽涉個人才性與文章風格，總之，江氏不以沿途風致為描寫重點，也不以生動、豐贍的辭采取勝，佈局毫無刻意之處，強調親歷的見聞記錄，在擴散和傳播上才是他書寫的動機吧。此書敘述描寫、抒情的文字較少，如有之，也多半是記錄其參觀遊覽及路上所見，對社會、教育、演講等發表見解，這些說明文字所佔篇幅極多。不可否認的，這些記述、說明手法削弱了游記的藝術性，但卻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尤其隨文附圖（十五張）、附詩的方式，稍補充了文字所沒有呈現的畫面及抒情性，而珍貴的圖像也與口述、書寫一樣，有助於對歷史的追尋。吾人透過本書顯露的蛛絲馬跡，大抵還可以得到一些真實生活的反應及文獻史料的意義，阿里山一段的描述，可看到日本人來臺觀光之現象（另有阿里山神木圖），臺灣在日治殖民中期開始，就出現大量的觀光設施與旅遊活動，旅行成爲一種中產階層的喜好，反映出交通系統、鐵道旅行文化透過教育制度與媒體宣傳達到效果。當時以「產業」、「殖民建設」、「宗教」作爲臺灣旅遊之重點，各城鎮的旅遊也往往是以神社爲核心。

同時本書對華僑、領事館、僑教著墨處甚多，對當時僑界現況的了解有甚大幫助，也留下可貴的史料。如書中提及中華總會館總幹事林梧村君及臺灣之中華會館，最有統系，亦最有權威。「民國十六年。臺北始有中華會館。各地聞風興起。今已徧及三十餘埠。并於臺北設中華總會館。」<sup>24</sup>（《臺游追記·會館組織》，頁9）復提及中國駐臺領館之設立，「館係租用市外民房。有樓兩幢。一爲各職員辦公會客之處。一則總領事住宅。公私略具規模。聞今年甫遷入。」（《臺游追記·領館

<sup>24</sup> 此處略有小誤，中華會館設於1923年10月10日，非1927年。

規模》，頁 13）對照張超英口述，陳柔縉執筆的《宮前町 90 番地》可以了解 1934 年總領事即郭彝民，領事館所在地在宮前町九十番地<sup>25</sup>。如果對照於江氏其他旅游之作，如《南游迴想記》，可知其觀察重點及書寫形式大同小異，幾乎都著重在領事館、僑教、演說、街市游觀、女學生及當地社會現況，每一主題則喜以四言標示以凸顯，如「護照手續」、「領館簽字」、「華僑生活」、「華僑教育」、「參觀學校」、「交通發達」甚至「邱菽園君」、「上岸情形」不一而足，可見有意湊成四字句，綱舉目張，但標題仍充滿隨意性，未能字斟句酌。此外，書中提到「王少濤君者，雅擅三絕，筆墨敏捷，辱贈作品甚多，並約余開年再來，專遊山水，不近俗人。」比對張純甫 1934 年 9 月 4 日的日記記載：「少濤來坐，夜飯言江亢虎於二時到竹，彼與同車，曾見之。」<sup>26</sup>惜《王少濤全集》編撰時，頁 392 漏了王少濤之詩作〈旅次呈江亢虎博士〉，以致年譜 1934 年條下亦未著錄此事。至於頁 29、32 有江亢虎照片，這些都可以做為日後全集修訂之參考。

<sup>25</sup> 張超英說：「父親在東京大學修讀的經驗，讓我們在臺北的家意外登上歷史舞臺。那時中國駐橫濱總領事郭彝民是父親東大的學長，一九三四年，郭彝民被調任駐臺總領事，正傷神張羅在臺北的官廳房舍。中華民國外交部的經費有限，郭彝民向我父親請託。父親和祖父商量，最後以象徵性的租金一圓提供我家前棟房子和一部汽車給中國領事館。臺灣省通志曾記載，新任總領事郭彝民調任，『是年擇臺北市宮前町九十番地民房洋樓西座為館址，房舍寬敞，頗壯觀瞻。』指的就是我家。把自家房舍近乎無償租給中國駐臺領事，父親曾在回憶文字裡表達了他那一輩人對『祖國』的熱情。他說：我想在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於臺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只不過，欣幸有之，困擾也隨之而來。日本警局密探常去『訪問』他，他來往的朋友經常被查問，他的行蹤也一直遭到監視。……一九四〇年，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外交部仍然選擇我家庭園房舍做臺北總領事館，直到戰爭結束。汪精衛和他的政府官員在抗戰勝利的剎那，頓時變成漢奸，臺北總領事館的外交官也未倖免。」《宮前町 90 番地》（臺北：時報文化，2006 年）。

<sup>26</sup> 見林耀椿：〈江亢虎在臺灣〉所附日記影本，同註 19，頁 215。



圖二：題署「江亢虎博士駕臨新竹淨業寺院攝影紀念」，左四為江亢虎。  
錄自《王少濤全集》，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江氏來臺一事造成影響如何？其所代表之意義又如何？本文前述可見，今再舉一例以說明。堅如〈文藝大眾化〉：「即所謂機械藝術。這個卻與在臺北大講演的。世界的學者江亢虎博士。所提倡漢文化的藝術暗合。結果其真髓。倒不外是一個藝術與科學合流的機械主義。因為機械的本體。站在靜止的地方。純粹是個藝術。然若動作起來。即是科學的了。如果可以推及江亢虎先生所提倡漢文學的藝術化。祇因立場不同的關係。故不能不作如此的主張了。」<sup>27</sup>此文雖相當夾纏不清，但基本上認為：「假使其基本觀念。若扞格了大眾的生活。則其文藝作品。雖是多麼奇觀。也不能算做是有文藝的生命了。畢竟文藝的生命。完全是在於大眾的生活。」<sup>28</sup>這正是《臺灣文藝》上專文討論的「文藝大眾化」之問題。

江氏回上海後，隔年（1935）中華書局出版了《臺游追記》，再過一年，胡懷琛撰文〈中國文社的性質〉<sup>29</sup>，引述了江亢虎對臺灣詩社及活動的描述，特別指出臺灣詩社的性質為何類型。至於《臺游追記·自序》所云：「割讓以還，內地遊人漸稀，記載尤所罕見。」是見仁見智說法。汪毅夫為證明閩臺兩地之淵源，曾舉廈門海關檔案編制的〈1895-1940年廈門口岸出入臺灣人數統計表〉為例，說明該表顯示 1895-1940 年間從廈門口岸出入臺灣的人數，最少為 2598 人（出）、4295（入），最多達 22572 人（出）、26183 人（入），總人數為 324977 人（出）、422862

<sup>27</sup> 堅如：〈文藝大眾化〉，《臺灣文藝》，創刊號，1934年11月5日，頁23。

<sup>28</sup> 同前註。

<sup>29</sup> 載《越鳳》半月刊，第22-24期合刊，1936年12月25日，頁8、9。



人（入） 年均出入人數為 7221.7（出）、9396.9（入）<sup>30</sup>。謂其私人旅行、生意往還、觀光考察名義來臺者為數並不少，而江氏以為內地游人漸稀，或許是因旅遊記載臺灣者較罕見，不似其他國家為多，且這樣的數字相較赴其他國家及割讓之前的情形為少。但是形成遊人漸稀的原因，通常是交通梗阻造成惡劣的旅行條件，或者是政治管制因素造成，觀之 30 年代日治下的臺灣，其旅遊條件較過去為佳，照理說來臺者為數宜可觀，或許是中土人士自顧不暇，深入中土西北或東南地區遠較跨海渡臺實際且經濟。

#### 四、游臺期間衍生的相關問題

##### （一）游臺動機備受質疑

張深切在其自傳《里程碑》（下）說：「總督府聘請江亢虎來臺巡迴演講，我寫一篇文章，叫他滾出去，意外迎合了當時臺灣青年的思想，氣壞了歡迎江亢虎的林獻堂一派人士。因此我和林獻堂越生隔膜，終至斷絕來往。」<sup>31</sup>然而江氏在《臺游追記》述其「游臺動機」：「余亦以足跡幾徧天下。而生平未抵此歷史上一名島。亟欲一觀野番初民生活。和蘭殖民遺規。延平王開拓之功。清政府經營之迹。及四十年來日本化之現狀。於是臺游之念以決。」（頁 2）他自己也澄清：「他不是任何人的爪牙，而是以一位學者的身份來這裡實話實說。」<sup>32</sup>其游臺動機似乎極其單純，純是觀光。翁聖峯對此做了些說明，如舉江氏告訴總督府特派員「在野學者。私人旅行。毫無使命。亦無目的。觀光而已。」（《臺游追記》，頁 8），如果江亢虎是總督府請來的，林獻堂何必熱烈歡迎呢？幾處論證皆見其思慮周密。個人欲補

<sup>30</sup> 該表格請見汪毅夫：《閩臺緣與閩南風：閩臺關係、閩臺社會與閩南文化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6、17。出與入最少的年度都是1938年，殆與七七事變發生有關，1935年從廈門來臺人數22572人，為歷年最多的一次，應是臺灣始政四十年博覽會的關係。1895年進入廈門人數最多，應是割臺動盪及國籍選擇因素。當然這不包括私渡的情況，當時旅遊券核發手續嚴格，不經海關查驗登記而私渡者不少。

<sup>31</sup>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黑色的太陽）》（臺北：文經社，1998年），頁524。

<sup>32</sup> 楊逵，翠花中譯，彭小妍主編：〈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評江博士之演講——談白話文與文言文〉），《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1年），頁103。

充說明的，乃在於《臺游追記》此書為作者返滬後之追記，書中似有為此而辯護之意味，反映了當時一般人正有此疑慮，而這疑慮從何而來？從書中「余此次護照。係託廈門青年會總幹事沈志中君代辦。極為簡便順利。往日本領事館簽字時。亦毫無留難。並由領事塚本毅君親出延見。招待殷勤。又蒙特給介紹書數通。證明余之身分與地位。殊可感也。」（《臺游追記·護照手續》，頁3）及「抵臺北之翌日。總督府派汽車來。并派招待員一人。隨同參觀各立機關、屬於文化教育性質者。」（《臺游追記·歷史博物》，頁17）領事塚本毅君並表示「代表政府，表示歡迎，並允予各種便利。」這種種優遇，不免讓人懷疑江亢虎與臺灣總督府彼此間之關係。尤其在彰化之演講，他反對白話文，批評新文學運動者，引發了青年的質疑：「用江博士這樣人我們非十分警戒不可。」讓人猜疑他是總督府派來的。何況過往他與日本糾纏不清的關係，遠在1902年10月江亢虎向袁世凱提交辭呈，再度前往日本求學時，日本社會各界和官方人士都以為他是到日本做留學生情報工作，並分化興中會等反清革命團體的情報人員，對他格外照顧，食宿上等賓館，出入有車接送，保護其安全<sup>33</sup>。1923年蔣光慈（1901-1931）致王培之信函，批評江氏「好出風頭，不知社會主義是什麼」的政治騙子，呼籲要設法把這種偶像打破以免淆亂是非<sup>34</sup>。1925年2月，清室善後委員會公佈了清室密謀復辟的大量文證，其中有江亢虎致廢帝溥儀（1906-1967）的請求覲見書以及給一些支持復辟的前清遺老們的信函，江亢虎為人所痛斥<sup>35</sup>，不得不解散中國新社會民主黨，跑到美國，

<sup>33</sup> 後由於秋瑾女士在一次小型集會上揚言要除掉清廷的走狗江亢虎，1904年9月，終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輟學回國，結束了在日本的留學生涯。見章慕榮：〈無恥多變的江亢虎〉，《文史天地》2006年第8期，頁32。另見郭長海、李亞彬編著：《秋瑾事跡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頁224-225。

<sup>34</sup> 哈曉斯：〈蔣光慈旅俄殘簡及佚詩〉，《文學評論》（1983年3月），頁139、140。

<sup>35</sup> 1925年8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載：「近日各報紛載中國新社會民主黨首領江亢虎，參與復辟陰謀，上海黨員，群起質問。茲將江氏致各報館函文錄下：記者足下：頃見報載復辟（誤為群）陰謀，牽涉鄙人，不勝駭異。當去年清室優待條例尚未取消時，確曾因金君而見溥儀，並依照約法，尊以外國君主之禮。生平好奇，各國元首多得晤見，援例請覲，並贈以拙著社會主義書數種。當時各報新聞，多有短載，此特宣傳之一道而已。復辟云云，何與我事？亢虎但知隨緣說法，倡導夙昔之主張，任何陰謀，皆不與聞辟紙標題故神其說。強人入罪，斷難忍受。至興漢滅滿十二不可說，已在民二出版之洪水集印布。合併聲明，至希披露，即頌撰安。江亢虎拜。八月五日。」另見孫玉蓉輯注：〈俞丹石入清宮清點文物日記摘抄〉載1925年8月6日事：「今日清室善後委員會宣布江亢虎

再度進入加利亞福尼亞大學執教。1932年初江亢虎回到上海定居。1934年8月來臺，回溯其過往形跡，加上來臺後的言論讓新文人大失所望，也就更加重了對他的不滿，甚至說要將江亢虎驅逐出境。

中國文人來臺，因總督府的介入，或不實的報導，總予人想像空間或誤解。1911年時梁啟超的臺灣行，日本《神州報》即報導其為受臺灣總督府之邀請，並是為日對臺的治績歌功頌德而來。梁啟超對此造謠之事大為惱火，立即寫了〈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刊登於《國風報》上，表其心跡曰：「……謂吾受日本臺灣總督府之招，將往頌其功德，殊不知吾游臺之志，已蓄之數年。凡稍與吾習者，誰不知之。而此次之行，乃不知託幾多人情，忍幾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後，每日又不知積幾多氣憤。夫閱貴報之人，皆未嘗與吾同游，則任從公等顛倒黑白，亦誰能辨者。然吾之此行，臺灣三百萬人，皆具瞻焉。一舉一動，莫不共見。吾能欺人乎。……無奈此行乃以傷心之現象，充塞吾心目中，若有鯁在喉，非吐之不能即安。……公等日日惟以閉門捏造新聞為事，不轉瞬而所發現之事實，適與相反，其毋乃太心勞日拙矣乎。」<sup>36</sup>過去的研究大致上也針對梁氏為人行事及其來臺後之言論，證其受臺灣總督府邀請之不實與誣指，但近年新見《日文檔案》似乎也見背後之複雜，為了順利來臺不得不先取得伊藤博文的介紹函，因日本特務之監視，演說時復有所顧忌，讚揚日本對「本島的施政，表示希望諸位作為日本臣民不要不服，應誠心誠意忠實於國家」、「與其在清國的頑冥政治下生活，不如當帝國政府的臣民幸福。而且讚揚本島發展迅速並各種設施井然有序。」<sup>37</sup>這種種言論遂招致上海《神州日報》之批評。江亢虎游臺是否負有政治使命，迄今不得而知，視其「上阿里山，當地官廳又擬派人沿途招待，併發電代訂旅館，

---

函、金梁等奏摺，此案涉及名流絕多，不知若何收拾也。」《文獻季刊》（2006年10月），第4期，頁103。陳獨秀譏江氏：「乃是『頗念舊恩，尚不忘本』的復辟黨」，見〈我們認識江亢虎了（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陳獨秀文章選編 下》（北京：上海·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頁68。

<sup>36</sup> 此書信寫於《書牘》第五信之同時，但不收錄於《書牘》中。刊登於《國風報》第二年第8期之「號外雜文」，宣統三年三月廿一日。

<sup>37</sup> 《日文檔案》總第450268-450271頁，警高秘第2029號，秘受第1517號。參見羅福惠、袁詠紅：〈孫中山、梁啟超旅台的補充研究——依據未刊日文檔案及孫、梁對日本態度的分析〉，收入林家有、李明主編：《清世界與正視中國“孫中山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頁580-598。

余亦婉言謝卻。」致嚮導相失，途中遇雨而狼狽不堪，似乎又是有意遠避總督府之籠絡，而當年梁啟超曾自述游臺緣由乃是「施政詳細察視」以「警策邦人之資」，但梁啟超離臺後與林獻堂書信往還，則透露了另兩件事：募款籌報及為國民常識會勸募。易言之，「募款」從事活動不便公開，卻是來臺目標之一，甚至是頗重要的任務。那麼，江亢虎游臺動機是否也可能另有其他想法，也就不無可能，因此其游臺緣由，此間容或有再繼續討論的空間，但得視新史料之出土。

## （二）相關抨擊的言論：張深切、楊逵之文

此一小節主要論證楊逵（1906-1985）〈江博士講演評〉（或譯為〈評江博士演講〉）一文刊登於1934年9月的《臺灣新民報》，以訂正之前的說詞。翁聖峯曾據當時一些言論，推測「張深切原本反江亢虎的文章可能刊在9月5日之前；而《楊逵全集》編者推測〈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是作於1934年11月，可能有誤。……此文刊於9月較為可能，而且很可能同樣刊在9月5日之前。」又說「張深切批判江亢虎之文目前雖看不到，但張深切（1904-1965）係臺中人，《臺游追記》稱在臺中醉月酒樓與新舊兩派鉅子三十餘人討論文化復興與地方自治諸問題，張深切是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臺中的首要人物，他應當參加了臺中這場聚會，因而比楊逵更早投稿反對江亢虎。」<sup>38</sup>總括翁氏論點主要是兩項：一、張深切的文章可能刊在9月5日之前。二、張文比楊逵更早投稿反對江亢虎。個人對於第一點基本上同意，第二點則持保留空間。其因說明如下，根據《灌園先生日記》（新10月17日 舊9月9日）載：

張深切於九月三日曾登載《新民報》謾罵江亢虎之文，謂其無血、冷血、頹廢主義者、無志氣、猶太人、開倒車選手，無數刻薄之辭。余謂其不反駁江亢虎之主義而徒謾罵，未免過於刻薄。他四時餘來說明其所罵之言非過火，若有因此而生反感者，我死尚不懼，雖受莫大之犧牲，亦所不惜也，蓋左派之作戰非如是不可也云云。余聞之甚為不快。

從林獻堂（1881-1956）先生於日記一貫行文的口吻來看，文中的九月三日應是新

<sup>38</sup> 翁聖峯：〈江亢虎遊臺爭議與《臺游追記》書寫〉，《臺北師院語文集刊》（2004年11月），第9期，頁37。

曆<sup>39</sup>，間接印證了翁氏所言：張深切文章刊在9月5日之前。至於楊達〈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sup>40</sup>，《楊達全集》編者推測作於1934年11月刊於《臺灣新民報》，翁氏謂此說可能有誤，我個人亦贊成翁氏這推論，該文是楊達於8月29日晚上聽完江亢虎的「文藝復興」演講後，於8月30日完稿的作品，但其正式發表的時間，並不很清楚（容後再敘），翁氏認為「張深切是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臺中的首要人物，他應當參加了臺中這場聚會」，因而張氏比楊達更早投稿反對江亢虎，然而楊達亦參加了這場演講，而且目前還存留兩篇批判文章，楊文是否較晚出？目前尚難判斷。《楊達全集》有二文係針對江亢虎此次演講而發，一篇是〈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篇題中譯：〈評江博士之演講——談白話文與文言文〉），另一篇是〈町のプロフィール〉（篇題中譯：〈小鎮剪影〉）。〈小鎮剪影〉刊登在《文學評論》的關係，中國文人胡風（1902-1985）留意到了，他曾翻譯過楊達〈送報伏〉、呂赫若〈牛車〉，出版了翻譯小說《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對楊達並不陌生，他寫了〈存文〉一文<sup>41</sup>，引用了楊達對江亢虎「文藝復興」演講引發的衝突始末，並對江亢虎宣導的「存文會」加以諷刺。胡風此文說：

<sup>39</sup> 此類例子頗多，如《灌園先生日記》（一）所述日期皆是新曆。1927年，新曆1月30日（舊12月27日）載：「不得已定來月七日開生產者打合會」，在新曆2月7日的日記即載明芭蕉生產者會合（討論）一事。因此1934年，新曆10月17日所言的《新民報》9月3日登載謾罵江亢虎之事，應即是新曆，非舊曆。

<sup>40</sup> 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年12月初版），頁109。

<sup>41</sup> 〈存文〉原載《太白》雜誌第2卷第2期，《太白》推動保衛白話文和推行大眾語，胡風此文當然是反對江亢虎1934年提出「存文會」保存文言的口號。徐懋庸：〈江亢虎文存〉亦嘲諷他，刊《太白》半月刊第2卷，頁2-3。《太白》刊名為魯迅所取，魯迅亦曾以江亢虎「保存漢字保存文言」的主張批評他，《且介亭雜文二集》：「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麼樣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說『德』之古字為『惠』，從『直』從『心』，『直』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裡去了，他竟連那上半並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胡風文復收入其雜文集《棘源草》（重慶：南天出版社初版，1944年11月）。現收入《胡風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卷4，頁30-32。

現在讓我引用一段關於江亢虎博士在臺灣講演「文藝復興」的紀事。這個速寫底筆者叫做楊逵，去年曾發表了一篇小說《賣報佚》（宜是送報佚），使日本底進步文壇和臺灣底大眾受了相當的刺激。他敘述了舊文化底代表者們歡迎江博士的盛況以後，寫道：

江博士開頭說：

「對於漢民族，可悲的不是失掉了臺灣和滿洲。真正可悲的是在於自信心，即對於自己底古代文化的自信心之消失」，

接著更進一步說到：

「想加強這個自信心就要認識自己底古代文化，計畫它底復興。」以後就猛烈地對於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底青年們發出了警戒。

這時候有一個青年站起來發了質問底第一炮：

「博士所說的是真實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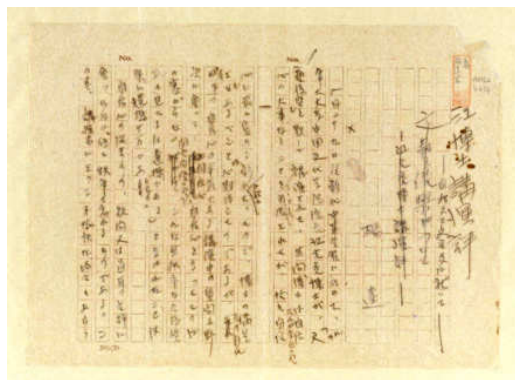
老練的博士用「有質問的人請向主持人提出，在另外的房間詳談」逃開了以後，就為自己辯護：「我是用自由的學者資格說話，並不是被什麼人收買來的。所說的話都是真實的。」

這個辯解雖然使他暫時逃過了難關，但因為他底謬論一層一層地發展下去，聽眾裡面有幾個人忍耐不住，罵起「說謊！說謊」來了。這樣一來，似乎他開始發現自己底權威受了傷害，憤然地下了講臺。接著，主持人吳衡秋（當地底協議會員）站起來挑戰地說：「剛才有人想提出質問，如有什麼質問的，請站到講臺上來講。」聽眾一齊緊張起來了。主持人方面臉上欣欣然地露出了嘲笑。但是，不是有一個工人模樣的男子把下馱（木屐）拖得嗒嗒地響，走上了講臺麼？一看到他，人們更緊張起來了。主持人方面臉色完全蒼白了。站在臺上的青年用了非常的冷靜向主持人表明了謝意以後，就逐一地指出了江博士底反動論點和古文學對於現代的關係，用「江博士這樣人我們非十分警戒不可」的話收束，走下了講臺的時候，臺下掌聲雷動，主持人站起來說了種種的辯解的話以後，反而用「這個會並不是討論會」的話來非難他自己請上講臺去的青年，於是會場沸然，罵聲震動。主持人看到勢頭不好。連呼「閉會！閉會！」

逃走了以後，大家一齊哄笑了。

這一篇文章說明了，中國對臺灣的認識理解，有很大一部份是透過日本方面的刊

物。楊逵在〈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一文中說：「我也不是任何人的爪牙，而是以一位聽眾的身份寫這篇文章，所以我也實話實說。」



圖三：〈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臺灣文學館典藏。

做為第二篇的〈小鎮剪影〉理應也是據實記敘，楊逵這兩篇文章的記載卻與演講者江亢虎事後的追記有相當大的出入<sup>42</sup>。江亢虎《臺游追記·會場花絮》說：

駐彰化之日。當地官廳及華僑聯合召集公開演說會。於歡迎晚宴後舉行之。講題為東方文化復興。聽眾八百餘人。稱一時之盛。余闡發民族復興與文化復興之關係。并說明非尊重保存固有之文化。不足以提起民族之自信心。會中忽有左傾分子。起立發言。力闢東方文化無復興之可能。附和者二三人。語嘵嘵不可辨。余請主席指令登臺自申其說。會場秩序。仍舊維持。而說者見聽眾無歡。亦興盡而自止。會散後。聞此二三人。皆新出自囹圄中。故其言特憤激。又聞當時員警本欲干涉驅逐。見余請其登臺。因亦未便阻止。余在歐美屢見過激黨人搗亂會場事。其方法如出一轍。若制止之。則立起暴動。而借作宣傳。反不如聽其自由發言自由退出之為得也。

<sup>42</sup> 筆者後來看到林耀椿〈江亢虎在臺灣〉一文，先使用了楊逵〈評江博士之演講——談白話文與文言文〉與江氏所記，事實不符合。然楊逵〈小鎮剪影〉及胡風〈存文〉，則尚未被拿來做為論證。

而楊達的記載卻是：

演講進行中不是發問的時機。有疑問的話，請等到結束後再向主辦者申請，另外找個房間發問。……他（吳衡秋）在演講會後向聽眾說：「要發問要反駁，請站到臺上發表。」他因此要求聽眾上臺。然而當一名青年站上講臺反駁，博士隨即卻跟了上去，說道：「這不是意見發表大會」他盛氣凌人，態度真是難看極了。

楊達二次所述皆是吳衡秋<sup>43</sup>請有意見者上臺，江氏的反應是結束後另找房間發問，後來某青年上臺反駁，江氏盛氣凌人說「這不是意見發表大會」。最後他見氣氛不對，權威受損，憤而走下講臺，而會場則是一片罵聲喧騷，譁然亂象，大喊「散會」，逃之夭夭。這牽涉到追記雖是欲記其真，但記憶未必可靠，隱惡揚善又是人之常情。江氏在序文中說：「余好游。游或有記。或無記。即有記亦率記之於既游之後。而不記之於方游之時。誠以方游之時。心專在游不在記。鉛筆小冊。偶記人名地名時日而已。游罷歸休。然後迴溯舟車所經。見聞所得。參以一時感想所及。信筆直書。連篇累牘。全藁既竟。略加詮比。命曰追記。記其真也。」心既專在游不在記，其錯誤自是難免。何況作者寫作時已不在現場，經建構編織、仲介而成的追記，可能因細節日益模糊，只剩下記憶的建構，而記憶通常不一定可靠，如果再加上有意的杜撰、穿鑿或隱瞞某部分情節，結果自然就有差異。或者是聽眾、讀者在與講者相隔情境下產生誤解，吳衡秋請有意見者上臺一事，據江氏之說詞是他請吳衡秋指令登臺自申其說，總之，這場「會場花絮」真是滿天飛舞，眾聲喧嘩<sup>44</sup>。

至於楊達〈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一文是否正式發表？《楊達全集》使用的是手稿本，編輯校訂者在注一交代說：「可能曾發表於《臺灣新民報》（1934年11月），但未搜集到此一版本。」翁聖峯對此說明「週報《新高新報》，反映時事的速度較慢……，而《臺灣新民報》較為新知識份子所青睞，故楊達與張深切文章刊於當中較為可能，不過，日治時期楊達部份稿件也刊於目前

<sup>43</sup> 吳衡秋，在楊達、張我軍文中皆寫為吳「衡」秋。

<sup>44</sup> 江亢虎喜演講，《史地學報》多次刊登了其演講稿。但或許其人思想的關係，被質問情況亦不鮮。李希文：〈方志敏質問江亢虎〉，《檔史文苑》1997年第1期，亦記聽眾提問尖銳問題，招架不住，匆匆結束演講。



幾已完全散佚的《臺灣新聞》上，故楊逵反江亢虎作品刊於《臺灣新聞》亦不無可能，……《楊逵全集》編纂者僅從手稿推測印刷的出處及時間，已找不到該文的刊印原稿，故無法提出確切的答案。」<sup>45</sup>然《楊逵全集》中另有〈藝術是大眾的〉一文<sup>46</sup>，可證楊逵〈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正式發表在《臺灣新民報》。在〈藝術是大眾的〉這篇文章裡，楊逵談到「所謂的文學，是爲了要向人傳達思想感情，而以文字來進行的手段。因此，文學的最高目的在於最充分、最精確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最完整地傳達給他人。」並寫著「《臺灣新民報》〈評江博士演講〉——楊逵」<sup>47</sup>，「所謂的文學」這段文字正見諸〈評江博士演講〉一文，楊逵在〈藝術是大眾的〉一文裡再次引用及強調了自己的看法，也間接證明了〈評江博士演講〉一文確實是正式發表，而且刊登在《臺灣新民報》。

如此看來，《楊逵全集》編者一時未察，因此注文所云「可能曾發表於《臺灣新民報》(1934年11月)」，反引發讀者更多疑惑。楊逵此文完成於8月30日，似乎不可能到11月才發表，編者並未說明訂在11月的原因，或許是因〈小鎮剪影〉發表在《文學評論》第一卷第十號1934年12月的關係，當然這也僅是筆者個人的推測，並無法去實證。筆者認爲該文可能在9月初即刊在《臺灣新民報》，11月份刊登該報則不免予人疑惑，因爲臺灣文藝聯盟與《臺灣新民報》的關係漸惡化，《臺灣新民報》曾發出通告：「民報非文聯之宣傳機關」，使文聯立場更爲困難<sup>48</sup>。爲此張深切在「文聯報告書」裡頭說明：「自《臺灣文藝》出版前後，因消息間斷，乃致許多同志頗疑聯盟與民報發生齟齬，頻有來訊或直接前來詢問，初時聯盟極力否認其事實。及至最近，民報對聯盟之壓迫愈加露現，似乎無可隱諱的情勢了。」

<sup>45</sup> 翁聖峰：〈江亢虎遊臺爭議與《臺游追記》書寫〉，《臺北師院語文集刊》(2004年11月)，第9期，頁42。

<sup>46</sup> 刊《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出版)，頁127-140。此文完稿時間1934年12月31日，原刊於《臺灣文藝》第2卷第2號，1935年2月。中譯文亦收入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1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頁134。

<sup>47</sup> 同前註《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136。頁109註云：「可能曾發表於《臺灣新民報》(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sup>48</sup> 據《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社，1998年)，卷2，張深切認爲同是臺灣人經營的言論機關，需站在同一戰線，做臺灣民眾的喉舌，但當時《新民報》的一些老幹部嫉視少壯派的發展，不肯以老大哥的風度提拔後進，甚且竟說該報不是文聯的宣傳機關，經張深切幾次交涉亦無結果。

然而本部始終鎮靜，極力回避衝突，例如前次本人曾草一篇〈文藝聯盟抗新民報檄〉也終於秘而不表，祇草一張書信向羅專務和林主筆抗議而已。本部對民報之誠意，自敢信無失禮地方，而且『臺文』出版時便隨刻遞送民報八冊以表殷懃，詎料民報不但受而不謝，反謂『民報非文聯之宣傳機關』責難備至，對『臺文』之各同志批評原稿聽說略時吞沒，吾人固知此罪並非民報本身應負的，但是辦事員的驕傲與專橫似乎已與吾人難能再隱忍的田地了。本部擬再向民報叩詢真意，如果仍執迷不悟，或許吾人將要對它不住吧。」<sup>49</sup>此文刊登於1934年12月，而林獻堂在1934年11月日記也說「深切言《新民報》文藝部長李金鐘不肯登載文藝協會之記事，甚為不平。」<sup>50</sup>可知《臺灣新民報》在11月時與臺灣文藝聯盟及其成員已有摩擦，楊逵是否會在11月時將〈江博士講演評——白話文と文言文に就いて〉一文投《臺灣新民報》，也就不無疑問。

### （三）有關日華親善與雜誌傳媒的宣傳

江亢虎在《臺游追記·大屯吟集》云：「有瀛社者。假座其間。開特別會。以歡迎餘。並請為是屆大宗師。拈題大屯斜照。得東字七言長律。社員與試者約四十人。主席某君。前清之秀才。而當地之紳士也。席間大唱親善論。余則以屈原杜甫責望之。」（頁41）這一段記述並未提及某君姓名，可能他刻意迴避不提，也可能不記得了<sup>51</sup>。但對照當時報刊所載，《臺灣日日新報》標題「瀛社例會宴江博士近四十人會於大屯酒場 詩題大屯斜照」云：

<sup>49</sup> 張深切：〈文聯報告書〉，《臺灣文藝》第2卷第1號（臺中：臺灣文藝聯盟，1934年12月18日），頁9。另〈《臺灣文藝》北部同好者座談會〉載張深切之發言，亦對《臺灣新民報》諸多不滿，謂其不培養臺灣作家，割捨島內作品而以轉載中國作品為能事，是非常無意義的事，又說「今天的『新民報』，在認識時代的態度上實在太差了。」原刊《臺灣文藝》第2卷第2號（1935年2月）。中譯文收入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第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頁126-127。譯文由陳芳明等主編《張深切全集》提供。

<sup>50</sup> 「新十一月九日 舊十月三日」日記，見《灌園先生日記》（七），頁425。

<sup>51</sup> 1941年謝雪漁七十大壽，他寫了〈雪漁先生古稀大慶即題所著周易探玄〉詩，第一句即言「十年一別謝元暉」（實際時間七年），似乎是知道其姓名的，而且應還有往還。

謝社長、代表一同起立致歡迎詞，盛稱博士之器識文藝，及高唱日華兩國，夙以同文同種，唇齒輪車之關係，願益敦友交，左提右挈，藉以實現大亞洲主義。<sup>52</sup>

《昭和新報》標題「瀛社例會 兼延民國江博士 臺北瀛社舊七月例會」亦云：

由瀛社長謝雪漁老擬題……謝社長起而以國語敘禮，略謂江博士此次告假歸國，利用好機，遙涉暖潮，特到吾臺，視察文化。吾儕同人得以攤箋鬥韻，何幸如之。……江博士頃雜談之際……吾輩更有所希冀吾臺原為中國一部，今乃屬日本帝國領土，吾人於兩國之間，實居調和親善之地位，蓋中國民國，與日本帝國，同國於亞洲之域，實不可不協力一致，以解決亞洲之難局，吾人之力雖微，竊願竭此微力，以圖兩國之親善，願博士歸國之際，對中國有識之士，盛傳吾人之意志云云。<sup>53</sup>

這兩處報導，則明顯可見是指謝雪漁（1871-1953）其人，當時在臺言「日華親善」，正是配合了總督府之政策，並無回避之必要，但江氏當天初為履臺賓客，是否即當場責望之，臺灣方面的報導自然沒提及也不便提及，但在《臺游追記·大屯吟集》則強調了他當時的反應<sup>54</sup>。這一天是1934年9月7日，當晚他還曾提出「詩人宜盡力文化，致意國事，所謂餘事作詩人，非詩人專作詩也。而詩與文原合璧，文不離詩，詩亦不能離文，徒作詩而不能文，非學人之本分，且敷衍文化與民族之存亡，有甚大關係，其文化被滅，即是其民族被滅云云。」<sup>55</sup>游臺期間他對臺灣漢詩社的末流提出針砭：「遂變為吟風弄月之作。桑中陌上之音。變本加厲。每下愈況。甚者至於歌頌盛德。鼓吹休明。彷彿科舉時代之試帖。彌可鄙已。」（見《臺游追記·詩社盛況》，頁40）但1940年3月，江亢虎卻出任了汪精衛<sup>56</sup>政權（國民

<sup>52</sup> 《臺灣日日新報》第12371號，昭和九年（1934）九月十日，第8版。

<sup>53</sup> 《昭和新報》第297號，昭和九年（1934）九月十五日，第13版。

<sup>54</sup> 當時謝雪漁年六十四，江亢虎年五十二，江氏輩份為低，且又是受邀宴之賓客，謝氏當時在文壇又是執牛耳之地位，江亢虎是否當場即以屈原杜甫責望謝雪漁，不無疑問。

<sup>55</sup> 《昭和新報》第297號，昭和九年（1934）九月十五日，第13版。

<sup>56</sup> 1904年9月江亢虎從日本回國後，擔任了刑部主事和京師大學堂的日文教習，通過與歐美、日本等國駐北京外交官員的頻頻接觸，江亢虎感到大清帝國內憂外困，已是奄奄一息

政府)的政府委員、銓敘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前後又撰寫一系列文章，如為日本法西斯開脫的〈「南京慘案」之我見〉、鼓吹「大東亞共榮圈」的〈國際的孔子與孔子的國際〉(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廣播)、〈大東亞戰爭與中日文化協會之使命〉及〈故須賀中將不死〉等文，淪為世人口中的漢奸<sup>57</sup>。從批判日華親善到擁抱「共存共榮」，他的思想轉折或者內心世界如何，我們沒有更多資料可以進一步再探討。倒是臺灣人士似乎沒很快淡忘他，1935年《風月》刊登了江亢虎詩作〈初秋回里途中雜詩〉：〈橫峰縣〉、〈七夕〉、〈先祖資政公先妣徐夫人均渴葬茶山寺外自庚子始出洋迄今二十三年〉，選刊者於詩後評曰：「江博士昨年來臺游歷吾瀛社為開歡迎宴於大屯旗亭。博士詩才敏捷。略似溫八叉。前詩乃其舊作。橫峰縣詩頸聯。當胸磊塊。極目巉岩。蓋有慨而言之者。七夕詩。不信雙星尚少年。為前人未曾道破。甚有風趣。茶山寺詩。叫月啼煙之句。甚雋。」<sup>58</sup>《風月報》115期，蔣培中編「詩壇」，登錄江亢虎〈俞曲園先生百二十年生日感賦〉詩；125期，蔣培中復首列江亢虎〈雪漁先生古稀大慶即題所著周易探玄〉一詩；次期(126期)且有「為蔡哲夫先生求賻啓」之啓事<sup>59</sup>，發起人三十位，首列江亢虎。1941年《風月報》改為《南方》，刊登了江亢虎寫給雜誌的賀辭：「民國卅年七月 國風光憶舊時 聞軼事費吟思 家鉅子新頭鬢 異蒐奇習妙辭」，雜誌編輯則於墨寶下題曰「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江亢虎先生題」<sup>60</sup>

筆者於《梁啟超、林獻堂往來書札》一書末尾附論文，討論梁氏游臺在文學層面上的影響，當時對其卒後，臺灣文學雜誌仍選刊其作品感到好奇，但並未能進一步展開討論。文云「其後《風月報》復選刊〈臘不盡二日遺懷〉，此詩作於清

---

，便一方面表示效忠清廷，與奕劻、袁世凱、廢昌等權臣交往過密；一方面則又暗中與反清人士接觸，並設宴款待了進京活動的同盟會評議員汪精衛、朱執信等人。其與汪氏熟識可溯於此。

<sup>57</sup> 據聞「孫中山曾對人提起江亢虎此人如若不投身革命，勢必為反動勢力所利用，即便身不由己捲入革命，亦極可能首鼠兩端，朝三暮四。孫先生一言中的，江亢虎此後的人生軌跡無一不印證了其預言。」章慕榮：〈無恥多變的江亢虎〉，《文史天地》2006年第8期，頁31。江亢虎與孫中山關係較深入討論，另見汪佩偉、李焯曾：〈江亢虎與孫中山關係評議〉，《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武漢)》(1998年2月)。

<sup>58</sup> 《風月報》第6號，1935年5月29日，頁4。

<sup>59</sup> 《風月報》第115期、125、126期出處，分別為1940年8月15日，頁25；1941年3月3日，頁29；1941年3月15日，頁13。

<sup>60</sup> 《南方》第136期，1941年8月15日，頁10。

光緒三十四年臘月二十八日（1909年1月19日），歲暮又屆，羈留日本，一事無成，思鄉懷親湧向心頭。梁氏卒於1929年，此詩再刊距其卒年有十年之久，距其詩歌創作則有三十年，在蘆溝橋事變爆發，中、臺關係有意被日本當局隔絕下的情境下，《風月報》何以會再度刊出這些作品？誠令人關注。」<sup>61</sup>然如綜觀當時亦時錄鄭孝胥（1860-1938）等附和汪政權諸氏之詩作，及本文所討論的江亢虎在《風月報》的作品，似乎雜誌有著「日華親善」的宣傳目的，尤其是謝雪漁擔任過《風月報》主編，以其一貫立場來看，日治末期的臺灣漢詩壇及雜誌選刊中國文人的作品，不無有著文化交流，結合國策之意味<sup>62</sup>。尤其蔡哲夫（1879-1941）卒後，發起為其求賻金之事（協助中國貧困文人之葬禮）登載在臺灣刊物，多少有著日華雙方人民相互提攜、親善的作用。近衛文麿（1891-1945）在《華文大阪每日》創刊賀詞中即說明：「關於兩國民間之相互諒解，其方法固多，但其快捷方式，相信在於新聞雜誌等文化之溝通，藉互惠國民人情，兼闡明聖戰之真義。」<sup>63</sup>其時雜誌為建設東亞漢文化而致力漢詩之交流，尤其刊登那些有日本經驗的中國文人之詩文，江亢虎之作多次出現在《風月報》、《南方》，而到1940年時，他也正式投懷汪精衛政權，日本殖民當局的宣傳政策：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畢竟也起了相當的作用。

施懿琳曾舉臺灣作家徐坤泉在〈滄海桑田〉（署名老徐）一文中，對汪氏的作為，予以高度的肯定，徐云：「同是國民黨出身的愛國志士，難道老蔣一派的人才可以愛國，汪精衛氏一派的人就不可以愛國嗎？……汪先生早覺得日華兩國的民族，是同文同種，無論如何爭戰，終要走上提攜親善的大道，認為同負有東亞興亡的責任，所以由重慶脫出，發出艷電，招集真實愛國的同志，作那『自助者人亦助之』的和平運動……」<sup>64</sup>施氏由此論證從徐坤泉此文可以看出，「某些殖民地的臺灣文化人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思維合拍同調的狀況。而當時為日本所操縱的中國『淪陷區』，其實也有不少人，與徐坤泉一樣，是站在支持日本，支持汪政權的

<sup>61</sup> 許俊雅：《梁啟超、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9月），頁199。

<sup>62</sup> 當時舊作重刊或轉載中國文章的情形很普遍，甚至林獻堂《環球遊記》亦重刊過，此固然是值得探討的現象，但從刊登汪政權文人作品之頻率視之，此中自宜有日華親善之謀思。

<sup>63</sup> 《華文大阪每日》創刊號，東京：東京日日新聞社，1938年11月1日，頁3。

<sup>64</sup> 此文刊在《南方》第152期，1942年5月15日，頁15。

立場，正面地肯定日華的合作關係」<sup>65</sup>。如此看來江亢虎詩作及墨寶在戰爭期被刊登，也就有跡可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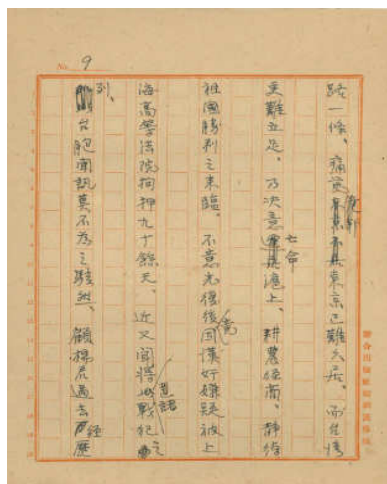
#### （四）楊肇嘉先生回憶錄何以片言隻字未提

曾接待他的臺灣名人楊肇嘉（1892-1976）先生回憶錄何以片言隻字未曾提及此事？楊肇嘉，臺中清水人，一生堅持臺灣人立場批判日本殖民統治者，曾加入新民會，參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1937年臺灣總督府擬定「臺灣米穀輸出管理法案」，企圖抑制米價，進一步壓榨臺灣農民所得，楊氏與吳三連、劉明電策動阻止，一生幾乎散盡家財義助文化事業，如：報紙、文學、藝術、體育、飛行等活動。後來移居東京、上海。江亢虎在臺中與民治運動領袖楊肇嘉見面，據江亢虎描述，霧峰林家係「託楊肇嘉通意。招往霧峯參觀。」江亢虎此書言及楊肇嘉氏「三十年來。備歷艱苦。務用公開合法政治手腕。與日本政府政黨相周旋。時常內外奔走。今適暫返故居。承以盛筵相招。假座醉月酒樓。並約同志三十餘人作陪。……楊君翌日復邀往其家。門雖近市。而屋後小有園林。屬寫屏聯數事。握手珍重而別。其後屢辱存問。各函皆文采斐然。筆勢生動。知楊君亦翰墨中人也。」（頁51）知其二人日後仍有書函往返致意，然則《楊肇嘉回憶錄》<sup>66</sup>全書竟無一字言及江亢虎？此一疑惑，起初我以臺灣光復後歷經二二八事變及白色恐怖的緣由看待，楊氏當時情境自需與漢奸撇清，免得惹禍上身。後觀讀葉榮鐘先生捐贈的書信、文物等典藏品，赫然發現楊肇嘉在臺灣光復後因漢奸嫌疑被上海高等法院拘押九十多天，最後還將被以「戰犯」處理，當時葉榮鐘與林獻堂等人組成的光復致敬團到了祖國後，由葉榮鐘擬書，營救楊肇嘉，最後楊肇嘉得以獲釋。飽受驚嚇，歷劫歸來的楊肇嘉，可能對這一段與江亢虎往返的交誼有意避開了。葉榮鐘原函已不可見，今所留存的書函草稿略云：「（楊肇嘉）為人剛直慷慨，有古俠士風，排難解紛，周急恤貧莫不傾力以赴，鄉人深以為德焉。民國十年，林獻堂所領導之革命團體文化協會成立，楊君毅然參與，膺任該會理事之一，緣是觸犯日當局忌諱，遂於民國十四年被迫辭職。……不意光復後竟因漢奸嫌疑被上海高等法院拘

<sup>65</sup> 施懿琳：〈決戰時期臺灣漢詩壇的國策宣傳與異聲——以《南方雜誌》（1941~1944）為觀察對象〉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2003年10月，收入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11月），徐坤泉其人之言論作為尚有很大討論空間，此處不及。

<sup>66</sup> 《楊肇嘉回憶錄》1967年出版，臺北三民書局曾多次再版。

押九十餘天，近又聞將置諸戰犯之列，臺胞聞訊莫不爲之駭然，顧楊君過去經歷，寤寐不忘祖國。」<sup>67</sup>江亢虎於二戰後亦以漢奸罪名被判刑，同樣於上海提籃橋監獄蹲牢，楊肇嘉歷劫歸來，對當年與江亢虎之交往，是有可能迴避不提的<sup>68</sup>。此段因戰後對當局施政頗有微詞，才引來的牢獄之災，吾人在《楊肇嘉回憶錄》可以清楚了解其來龍去脈，<sup>69</sup>但回憶錄僅提及「朋友們並代我提出我於日據時代的各種運動事蹟，予以證明一切。」以此觀之，朋友們即是指林獻堂、葉榮鐘之援救。



圖四：「光復致敬團營救楊肇嘉的信件」，葉榮鐘草稿。「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藏品。

<sup>67</sup> 葉榮鐘捐贈文物見臺灣清華大學圖書館，目前有「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之建置，網址[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guide/guide\\_08.htm](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guide/guide_08.htm) 此函稿十頁，文長僅錄部分。目前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的《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5年4月）錄有此「陳情書」，署名「臺灣光復致敬團」，頁255、256。

<sup>68</sup> 筆者按：本文審查委員以為「《楊肇嘉回憶錄》是楊達代為執筆的，楊達不寫這一段是否也有可能？」謹存其說。

<sup>69</sup> 見《楊肇嘉回憶錄》「再度做囚」一節，頁350-355。相關資料亦可見轉載上海僑聲報的一則靖雨（寄）：〈臺灣醜事連篇〉，《前鋒》1946年第15期，頁18-20。《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頁203。許雪姬：〈他鄉的經驗：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運動口述訪談〉，收入當代上海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 來自海峽兩岸的探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00。許氏此文可見第二歷史檔案館（許稱南京二檔館）有楊肇嘉被捕資料，柯台山建議她使用《楊肇嘉回憶錄》之敘述。

由此再延伸談另一相關之事。《楊肇嘉回憶錄》出版之際，當時政治氛圍仍肅殺，直到 1982 年下村作次郎訪問王詩琅時，當時與江亢虎有所接觸的王詩琅並未隱諱不言，見〈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以文學為中心〉（蔡易達譯）一文，吾人方知王詩琅應邀出席了 1934 年 8 月 26 日臺北文藝界在江山樓舉辦的歡迎江亢虎文藝座談會，當時臺北文藝青年齊聚一堂，也因之牽成王詩琅與臺灣文藝協會的關係，《第一線》開始見王氏作品刊登。<sup>70</sup>此次歡迎會有照片為證：



圖五：臺灣文藝協會主辦江亢虎歡迎座談會。前排右四江亢虎，後排右二王詩琅。資料來源：《臺北文物》第 3 卷第 3 期。

## 五、結語

在西潮激蕩及救亡圖存的國族主義意識型態下的遊記書寫，不同於傳統文人雅士之流連山水勝境，耽山臥水，寄情煙波，進行純粹的清遊活動。其取向與關懷毋寧是以客觀精確的知識來展示，《臺游追記》對臺灣記載與論述，不著重外在景觀，而是觀察與觀感的發抒。30 年代前後，中國旅行西北蔚為風尚，相率投入前往西北考察遊歷的行列不少，江亢虎卻選擇了海外的臺灣，除了是書中談及到的因緣際會，也應該與他旅行世界多國，卻未嘗一睹臺灣有關。政權轉移與異族

<sup>70</sup> 見蔡易達譯：〈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以文學為中心〉一文，翁佳音、張炎憲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頁226。



統治等「斷裂」的表像之下，並沒有完全阻礙知識階層的文化活動與發展，他選擇旅行臺灣，跨出自己的文化封域，描述其足跡所到之處，介紹給中國人。他所書寫的旅行記述，先在報章刊出，然後結集出版，足見說明了臺灣紀遊有其銷路，對割臺近四十年的臺灣的陌生化，並欲了解在日本統治下的情貌，旅游臺灣的調查遊記自然有借鑒作用。其在臺的路線、景點，多少有總督府的安排建議，呈顯臺灣在被殖民之下的充滿設計的展示過程。但江氏在面對臺灣，尤其是古跡勝境的描繪，不免鋪陳臺灣與中國歷史的固有淵源，地理歷史化之書寫策略，使得臺灣密不可分地與中國歷史連結一起，此中固多少有其對國族之召喚與想像，尚不致失其民族情感。他體驗日治臺灣現代性的一面，以臺灣之拓殖開發，進步之現況激勵國人，對學校、教育、衛生、慈善、產業、博物館、圖書館、體操、婦學、鐵道交通設施等等均有細膩的觀察，尤其是對華僑、領事館、僑教之著墨甚多，同時也批判日本人在臺的若干政策，因越界所以能產生比較，作出判斷，但也因對臺灣的陌生化與無知，提倡東洋文明，反對白話文，使他在臺短短十九天，就喧騰眾口，成為議論焦點，懷疑他來臺動機，甚至要他離開臺灣，「請到歐西去主張」<sup>71</sup>。甚至因其言論，引發張深切「和林獻堂越生隔膜，終至斷絕來往。」<sup>72</sup>二人為江亢虎而生隔閡，實在是始料未及。

雖然他在臺多與當地紳士名流、地方當局接觸，被奉為上賓接待，也受到楊逵的批評，但他對臺灣資訊的掌握與認識，正可從此以得知社會之情實、設施之概要。追記一書中提到的種種，相信是口舌之詢問及典籍之閱讀所來，但書中沒提到他從何種著作中或別人的口述中了解臺灣當時的情形？他的理解引用與所據來源有何異同？書在上海梓行，引導著讀者走進臺灣，在閱讀空間中遊歷臺灣，他的影響力如何？並不甚清楚。本來江氏在海外的遊歷與其思想的發展是一可研究之課題<sup>73</sup>，這些遊歷對其新思潮新知識的體認應甚深，但本論文只以《臺游追記》為主，其思想轉折無法看出，這是可以繼續追索的議題。同時期西方、日本、中國人士來臺後的觀察、看法如何，也是可以比較之議題，以此才能更凸顯江氏有

<sup>71</sup> 楊守愚：〈呈贈 江亢虎博士〉，《新高新報》第44號，昭和九年（1934）九月七日，第15版。

<sup>72</sup>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黑色的太陽）》（臺北：文經社，1998年）。

<sup>73</sup> 《東方雜誌》刊登江氏〈游德鎔感想記〉、〈荷蘭五日記〉、〈游法感想記〉，19卷13號，頁97-103。《史地學報》亦有〈游俄雜譚〉，1923年第3號，頁81-86。

哪些獨特的眼光。做為歸國不久的江亢虎而言，旅行蒐集「(異國)文化經驗」，增加其在中國的社會價值，或許也是他書寫此書的動機所在。

1901年，十八歲的江亢虎就作為各地推行新政中的知識菁英，赴日考察政治。回國之後，袁世凱對他的政治見解和卓越學識讚不絕口。前半生平步青雲也是個引人注目的風雲顯赫人物。創建中國社會黨，宣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出訪過歐美、日本等十餘國，1934年來臺時，在瀛社例會上，希望臺灣文士展現風骨，不要依附統治權貴。他特別勉勵詩人當盡民族國家的職責，而非僅能舞文弄墨，但1940年，汪精衛政權成立，江亢虎擔任了考試院副院長，其作風復多爭議<sup>74</sup>。此後他的評價就以「可恥的漢奸」、「歷史的罪人」、「下流的政客」、「文化大漢奸」為伍，其人其事遂多受到輕忽與漠視，研究數量寡少，連楊肇嘉回憶錄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歷史本成王敗寇，唯就臺灣文化之建構，追記一書反映出的社會現象與時代心理及華僑史料上，特別具有時代意義，因此不以人廢言<sup>75</sup>。

<sup>74</sup> 石源華：〈研究汪偽政府的新史料——日本東洋文庫藏汪偽政府駐日“大使館”檔案概述〉依據檔案引述江氏對於：「汪偽政府肆意攻擊，不遺餘力」，復吹捧自己「再三進言，未得採納」，認為「中國並不是不能貢獻大東亞戰爭，以中國無盡之人力受日本之軍訓，……對英美之戰爭不能說絕無一點貢獻」，《民國檔案》（1999年2月），頁61，其挑撥日本軍部改組汪偽政府之意圖呼之欲出。從資檔案，可知江氏其人品操守確實予人相當疑慮。

<sup>75</sup> 另參「自白書」、「偵訊筆錄」、「首都高等法院檢察官起訴書」、「首都高等法院特種刑事判決」種種，收入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頁357-379。

## 引用文獻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部主編：《文史資料選輯 第41輯 總12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
- 不著撰者：《詩報》第90號，昭和九年六月十五日，頁2。
- \_\_\_\_\_：《昭和新報》第295號，昭和九年九月一日，第14版。
- \_\_\_\_\_：《臺灣日日新報》第12369號，昭和九年九月八日，第4版。
- \_\_\_\_\_：《臺灣日日新報》第12371號，昭和九年九月十日，第8版。
- \_\_\_\_\_：《昭和新報》第297號，昭和九年九月十五日，第13版。
- \_\_\_\_\_：《詩報》第90號，1934年10月1日，頁2。
- 加藤忠太郎：〈艋舺公學校兒童體格檢查成績〉，《臺灣教育會雜誌》67號，明治四十年十月，頁16-22。
- 北原白秋：《華麗島風物志》，東京：彌生書房，1960年。
- 石源華：〈研究汪偽政府的新史料——日本東洋文庫藏汪偽政府駐日“大使館”檔案概述〉，《民國檔案》，1999年2月，頁61。
- 朱雙一：〈梁啟超臺灣之行對殖民現代性的觀察和認知：兼及對臺灣文學的影響〉，《臺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 江亢虎先生演講，汪章才筆記：〈歐戰與中國文化〉，《史地學報》1923年第3期。
- 江亢虎：《臺游追記》，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初版。
- \_\_\_\_\_：〈西北歸來之感想〉，《天籟》1935年第1期。
- \_\_\_\_\_：〈初秋回裡途中雜詩〉，《風月》第6號，1935年5月29日。
- \_\_\_\_\_：〈現代女子教育問題〉，《女子月刊》第3卷第2期，1935年。
- \_\_\_\_\_：〈中國文化之復興〉，《陝西教育月刊》1935年第6期。
- \_\_\_\_\_：〈文化之意義〉，《中外文化》1937年第3期。
- \_\_\_\_\_：〈俞曲園先生百二十年生日感賦〉，《風月報》第115期，1940年8月15日，頁25。
- \_\_\_\_\_：〈雪漁先生古稀大慶即題所著周易探玄〉，《風月報》第125期，1941年3月3日，頁29。
- \_\_\_\_\_：〈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江亢虎先生題〉，《南方》第136期，1941年8月15日，頁10。
- \_\_\_\_\_：〈先祖資政公先妣徐夫人均渴葬茶山寺外自庚子始出洋迄今二十三年〉，

- 《南方》第 136 期，1941 年 8 月 15 日，頁 10。
- \_\_\_\_\_：〈袁項城印象記〉，《文友》1943 年第 10 期。
- \_\_\_\_\_：〈中國文化與世界使命〉，《文友》1944 年第 10 期。
- \_\_\_\_\_：〈國際的孔子與孔子的國際〉，《申報月刊》1944 年第 10 號。
- \_\_\_\_\_：《全臺文·臺游追紀》，臺中：文听閣，2007 年。
- 吳文星：《日據時期在臺「華僑」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 年 3 月初版。
- 老徐：〈滄海桑田〉，《南方》第 152 期，1942 年 5 月 15 日，頁 15。
- 李希文：〈方志敏質問江亢虎〉，《檔史文苑》1997 年第 1 期。
- 汪佩偉：《江亢虎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 年。
- 汪佩偉、李炤曾：〈江亢虎與孫中山關係評議〉，《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武漢）》1998 年 2 月。
- 汪毅夫：〈臺灣游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臺灣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臺灣研究集刊》2000 年第 2 期，頁 78。
- \_\_\_\_\_：《閩臺緣與閩南風：閩臺關係、閩臺社會與閩南文化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年。
- 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出版，1991 年 10 月。
- 依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從民間文學角度探討吳鳳傳說的演變〉，《原住民的神話與文學》，臺北：臺原出版社，1999 年。
- 林慶彰主編：《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台灣》（一）、（二），臺北：萬卷樓出版，2002 年 10 月。
-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七）》，臺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0 年。
- 林耀椿：〈江亢虎在臺灣〉，《臺北文獻》直字第 149 期，2004 年 9 月，頁 199。
- 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年 4 月，頁 357-379。
- 哈曉斯：〈蔣光慈旅俄殘簡及佚詩〉，《文學評論》1983 年 3 月，頁 139-140。
- 施懿琳：〈決戰時期臺灣漢詩壇的國策宣傳與異聲——以《南方雜誌》（1941-1944）為觀察對象〉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2003 年 10 月，收入許俊雅主編：《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4 年 11 月。
- 胡風：〈存文〉，《棘源草》，重慶：南天出版社初版，1944 年 11 月。
- \_\_\_\_\_：《胡風全集》，卷 4，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月。

- 孫玉蓉輯注：〈俞丹石入清宮清點文物日記摘抄〉，《文獻季刊》2006年10月第4期，頁103。
- 宮廷璋：〈羅素、杜威與江亢虎在湘演講的反響〉，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部主編：《文史資料選輯 第8輯 總108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
- 徐弘祖：《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1月。
- 徐懋庸：〈江亢虎文存〉，《太白》半月刊第2卷，頁2-3。
- 翁佳音、張炎憲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
- 翁聖峯：〈江亢虎遊臺爭議與《臺游追記》書寫〉，《臺北師院語文集刊》第9期，2004年11月，頁37。
- 高拜石：〈江亢虎之詭譎言行〉，《古春風樓瑣記》第七集，臺灣新生報社，1979年6月。
- 堅如：〈文藝大眾化〉，《臺灣文藝》創刊號，1934年11月5日，頁23。
- 梁啟超：〈《書牘》第五信〉，《國風報》第二年第八期之「號外雜文」，宣統三年三月廿一日。
- 張光直編：《張我軍詩文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9年9月。
- 張深切：〈文聯報告書〉，《臺灣文藝》第2卷第1號，1934年12月18日，頁9。
- 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二·里程碑（黑色的太陽）》，臺北：文經社，1998年。
- 許地山著，徐明旭等編選：《許地山選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5年。
- 許俊雅：《梁啟超、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9月，頁199。
- 許雪姬：〈他鄉的經驗：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運動口述訪談〉，當代上海研究所編：《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來自海峽兩岸的探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00。
-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3期，2008年9月，頁139-186。
- 陳柔縉主筆，張超英口述：《宮前町90番地》，臺北：時報文化，2006年8月初版。
- 章慕榮：〈無恥多變的江亢虎〉，《文史天地》2006年第8期，頁31-32。
-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

備處，2001年。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

靖雨（寄）：〈臺灣醜事連篇〉，《前鋒》1946年第15期，頁18-20。

楊守愚：〈呈贈 江亢虎博士〉，《新高新報》第44號，昭和九年（1934）九月七日，第15版。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67年。

葉榮鐘著，李南衡、葉芸芸編註：《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5年4月。

蔡易達譯：〈王詩琅先生口述回憶錄——以文學為中心〉，翁佳音、張炎憲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頁226。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羅福惠、袁詠紅：〈孫中山、梁啟超旅台的補充研究——依據未刊日文檔案及孫、梁對日本態度的分析〉，收入林家有、李明主編：《清世界與正視中國“孫中山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頁580-598。

## Kang-Hu Jiang's *Travelling Record of Taiwan*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Hsu, Chun-ya<sup>\*</sup>

[ Abstract ]

Kang-Hu Jiang came to Taiwan in August 1934 and published the book *Travelling Record of Taiwan*. Because he had been i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e way he observed the situation in Taiwan is similar to other intellectual traveling records written by others at that time, focusing mainly on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museums, libraries, physic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nd infrastructure like railroads etc. *Travelling Record of Taiwan* is of no exception in this aspect. During his stay, he was especially concerned with the education of the female and the culture of Taiwan. He also criticized several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This article, therefore, discusses the way this book was written and points out the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of it. Among others, four issues caused by Jiang's active presence in Taiwan will be examined. First of all, because of his promotion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and objection to vernacular Chinese, many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suspected his intention. Among them, Shenqie Zhang and Kui Yang wrote some articles to criticize his views. These will be reviewed. In the second pla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Kui Yang's articles and Kang-Hu Jiang's later record about his own speech. Was Yang Kui's article "Review on Professor Jiang's Speech: about vernacular and classic Chinese" really published? This article will revise the views in the literature of research on this issue. Thirdly, Kang-Hu Jiang's articles occurred several times in *風月報* and *南方*. Was this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was getting closer? Finally, the Taiwanese celebrity Zhao-Jia Yang received Kang Jiang Hu at the

---

<sup>\*</sup>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atter's arrival. Why there is no mention of Kang-Hu Jiang in Zhao-Jia Yang's memoir? After these issues are explicated, a general overview on Jiang and his works will be given in the end, based on all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Keywords:** Kang-Hu Jiang, *Travelling Record of Taiwan*, tourism literature, Kui Yang, Shen-Qie Zhang